

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的 当前学术气象与未来展望

王海光

内容提要: 近年来, 中国大陆文革史的研究由于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 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 开始了研究的学术化转型, 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 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气象。展望未来, 文革史研究的发展和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清理需要宽松的外部学术环境也需要学者自身的刻苦自律, 并利用新的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 努力构建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系统性的学科——“文革学”, 并使之成为对中国现代精神的反映与对现代文化的超越。

关键词: 文革史研究; 文革学; 史学史

作者介绍: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 《旋转的历史》(1995年出版); 《从革命到改革》(2000年出版); 《林彪事件》(2012年出版)。

Title: The Current Academic Phenomenon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bstract: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increasing interests among the people, changes in historical assumptions and viewpoints, and advancement i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have in recent years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how we resear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have contributed many new perspective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s to the field. Looking ahead, to develop further our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need a more open academic environment, individual scholars self

discipline and courage to apply new theorie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branch of learning, name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One that can be used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China's contemporary ethos and as a means to transce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Keywords: Studi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y; Revolution Studies; History of History Studies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经过文革史学者 40 年筚路蓝缕的艰辛研究过程，开始于平反冤假错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展于改革开放、开拓于二十一世纪的文革史研究进入了当下的新时代。这段“行走的历史”由于近几年来，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开始了研究的学术化转型，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气象。

当前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具有了一些新气象：¹

一、从追求历史“正义”转向追求历史真相

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首先是事实真相，价值判断是退居其次的。传统的文革研究，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正义”，甚至为了历史“正义”而不惜曲解史实。现在的文革研究，主要是

1 笔者在此借鉴了韩钢教授的归纳框架。见韩钢：《38 年来“文革”史研究的五点变化》，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 年第 10 期。

追求历史事实构建的准确，对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都一视同仁。对严肃的学者而言，他所从事的只是史实重建工作，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立场问题。

学术研究是客观性的求真研究，没有政治评价的义务。无论研究对象是林彪、叶群，还是江青、张春桥，都与政治“翻案”无关。如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出版后，就有“文革史料学进入吴李邱时代”的说法，还引发了某些小众群体为林彪翻案的诉求。《张春桥狱中家书》²出版后，一些人也有“可与葛兰西狱中书简相媲美”的厚誉。但文革史学者还是持有比较冷静审慎的学术态度。如王海光写《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³，反对把学术研究与政治翻案搅和在一起。金大陆、金光耀两人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对其史料价值做了非常精到的评论和定位。⁴学界对于《戚本禹回忆录》⁵出版的史料价值，态度更为审慎和客观。

二、从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转向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

历史研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价值立场，不能是结论在前的按图索骥。传统的官方文革叙事，固然都是在《历史决议》框架之下的叙事，有价值先行的立场。民间的文革叙事也存在价值先行的问题，不仅也会有意识形态因素，更会有其情感好恶因素和现实利益立场。而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是为真求实的研究，没有预设价值立场的。

近年来，严肃的学者已有了不因人废史的学术意识，恪守事实真相的学术中道，不会刻意去搞道德评判的事情。如阎长贵的江青研究，并不以自己曾遭到江青的迫害而有意丑化她，而是实事求是地讲述了江青的工作、生活和性格特点，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江青

2 《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海光：《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炎黄春秋》2015年7月。

4 金大陆、金光耀：《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

5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的脸谱化印象。⁶这种“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家风范，在文革史研究中尤其难得。

三、从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转向多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文革研究，基本都是政治史、事件史，不仅质地单薄，还容易被误导。一些著述把文革历史搞成了一副“谴责史学”、“控诉史学”、“阴谋史学”的面孔。当前的文革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领域，而深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在经济、生活、文艺、诗歌、戏剧、婚姻、家庭等方面，都有新的成绩。如首都师范大学就举办过几次以文革中婚姻家庭为主题的研讨会。

文革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仅有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方便，在学理上也很有必要性。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2011年出版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⁷一书，是从社会史角度写的地域文革史，内容丰富，学术质量很高。这是当局正式允许出版的第三部文革史专著。青年学者李秉奎研究文革婚姻的专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⁸，也是由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这些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的开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政治史的深化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平台。

四、由单一研究主体转向多元研究主体

新传媒时代带来了文革史研究的开放性，谁都可以参加到文革史研究队伍中来。当前的文革史研究，不再是官方研究机构“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多重身份多种观点的齐唱。

现在文革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复杂。在文革过来人中，有当年的政治风云人物，有被迫害被斗争的运动对象；有文革权贵人物，有普通工农兵群众；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一般组织成员；有当年的

6 阎长贵对江青的研究，见《问史求信集》相关文章。

7 金大陆：《正常与非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8 李秉奎：《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红五类”，有当年的“黑七类”；有造反派组织成员，有保守派组织成员等等。在研究者中，有高级干部，有普通百姓；有专业工作者，有业余爱好者；有退休老干部老专家，有文革后的新人新手……。其研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个人回忆，有研究报告，有分析评议，有具体考证，有空泛议论……。尽管人们的经历背景不同，能力高低不一，认识差异很大，但都有参与历史叙述的平等权利。其实，文革是一场号称亿万民众参加的宏大运动，本身就是复杂的，只有在多元研究主体的状况下，才能呈现出立体的完整的历史相貌。

在多元研究主体的情况下，自印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许多老人自己写的人生自传和回忆录，少量印刷留给家人和赠送朋友，这是自印本的由来。自印本因为没有审查一说，有些本子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況，很有史料价值。也有自印本因为史料价值高，而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如王光宇的《青史难隐》⁹，原本就是赠送友人的自印本。

从学科建设上说，文革史本来是中国当代史一个不成熟的幼稚分支，需要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建设。如周良霄、顾菊英夫妇本是治元史的著名学者，两人以70多岁的高龄，编著了一部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大书，分为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央首长讲话传信录》、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¹⁰。他们所做的，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史学基础工作，为学界又提供了一套详实的文革史料集。

五、从当事人的回忆史学转向反思者的研究史学

现在，经历文革的一代人，最年轻的也开始步入了退休阶段。人生的黄昏期，有着回忆往事的情愫和感怀，是回忆史学的阶段。近年来的文革回忆史学，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领域，由讲清楚过去的事情，进而发展到反思自己和研究文革。其中，以文革时期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的反思活动最为

9 王光宇：《青史难隐》，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

10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突出。北京是红卫兵的发源地。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在母校北京八中，以当年学生领袖身份，向文革受伤害的老师道歉。3个月后，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红卫兵标杆人物宋彬彬等人到母校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也为文革初期学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情道歉。老红卫兵道歉的事情在社会上迅速发酵，许多当年的老红卫兵都表示了对过去的忏悔。¹¹ 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社会上关于红卫兵、“老三届”的话题很多。最早采访和研究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米鹤都，近年来又主编了《回忆与反思》的口述历史丛书，从2011年至今已出版了6本，口述者已有红卫兵、“老三届”的30多人。¹²

“老五届”大学生进入口述回忆和反思的时间比较晚，但质量较高。做得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参与者数量多，反思有深度。当年“团派”和“四一四”两派组织的人物，都有回忆清华文革的文本。许多人对文革的反思已经超越了过去派性。如“四一四”派的第二号领导人孙怒涛与炮制异端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纓，今天对文革的认识则是大不同了。孙怒涛的《良心的拷问》一书¹³，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反思文革；而周泉纓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¹⁴，则是基本肯定文革的解释。原“四一四”派的杨继绳近年来对文革史的研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烂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

11 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2 米鹤都主编的这6部口述史都是在香港出版，分别是：《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一》，《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难得本色任天然》，《光环与阴影》，《往事与尘埃》，《当时少年曾经狂》。

13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14 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权。”¹⁵这是近年来学界关于文革史研究很有影响的论点。

地质学院“老五届”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也颇有进展。已有了不同版本，可以对比校正。北京大学的“老五届”学生，也有回忆录出版。如樊立勤的《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¹⁶，有很好的史料价值。他们这些对过去文革岁月的反思，无论现在观点如何，都可以看作是他们心路历程的跋涉记录。这个思想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革的过来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文革情结，会不由自主地带入文革反思中来。如在群众组织头头的文革反思，基本都是原“造反派”组织的人。就可以看到这种情结。

六、从聚焦中央决策层和领袖转向 关注地方贯彻层和社会普通人群

现在的文革史研究已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拓展，开始从传统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从过去的聚焦高层转向关心底层、社会和普通人的命运。这是一个问题意识的转型。而文革本身是复杂的，决策了的东西未必能贯彻下去，各地文革的情况大不相同，各个单位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中央精神贯彻到了基层，不能不走形。只有打通了高层文革、中层文革与基层文革的相互联系，才能立体地呈现这段复杂的历史。

在文革通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¹⁷、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¹⁸、史云、李丹慧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¹⁹，都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革地方史方面，民间研究者更为活跃，已从事件史开始进

15 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五柳村网站，2015年7月7日。

16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

17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18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入整体史，与官方地方史志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如：石名岗执笔撰写的《文革中的山西》²⁰，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²¹，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²²等，都具有对地方文革史的全景性视角。这些地方文革著作，披露了大量官史遮蔽的历史细节，有的是作者个人观点，有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观点。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文革研究者，也在私人撰写当地的文革史。

中央国家部委的文革史，现在也有一些民间私撰本，以外事口的成绩最大。已出版的有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²³、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²⁴等。中央调查部文革史也已有人撰写成书，自印出版。

从关注高层人物到关心普通人的文革命运，是把历史研究回归到人本身。只关注高层政治的历史是与世隔绝的历史，是远离民众的“达官贵人的历史”。只有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历史叙述才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在这方面，一些文革史学者已有了学术自觉。如金大陆关于上海一个普通高中女红卫兵红鸥命运的思考文章，就是一例。²⁵

在文革回忆录中，有些回忆家人文革遭遇的作品，感情真挚，细致入微，有很高的社会史和民众史价值。如周舵回忆母亲文²⁶，老鬼（马波）回忆父亲文²⁷。在历史匆匆过往的云烟中，最难留下的是情景和感受，时过境迁，后人很难体会到。而这类作品是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的。但这类作品是在白描中见思考，平淡中见功力，对作者的要求很高。在这方面，周舵的忆母文应是具有范本意义的。

20 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21 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

22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23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25 金大陆：《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

26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作者赠文。

27 老鬼：《我的父亲马建民》，《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七、从以领袖人物中心的道德评判 转向对制度和文化的深层探究

研究文革与评价毛泽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决议》把毛一生与毛晚年做了一个切割，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关于晚年毛泽东的研究，王若水的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²⁸，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对当时社会上的毛泽东热进行了有力地解构。该书是自由派老干部评毛的最具学理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后绝唱。可以说，以后的批毛者，虽有言论更激烈的，但在学理上鲜有超过者。

近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研究，已经走出权力斗争的分析框架。许多研究者把文革发生投射到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认识。王海光在《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²⁹一文中，提出要从三个时段来考察文革发生原因。一是从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考察中国一百年来革命激进主义恶性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原因；二是从中共执政后的中时段，考察中国移植苏式斯大林体制中的内在矛盾冲突到极致的体制原因；三是从大跃进败局后的短时段，考察中共党内矛盾从分歧到分裂发展到极致的政争原因。唐少杰认为，文革的发生和出现，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文革是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转型结果、近代百年危机的高度映现、现代中国数十年革命的总体折射、中共党内数十年斗争的凝聚体现。³⁰

在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方面，唐少杰具体指出了中共在1949年后建立的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七大制度”，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他认为：毛泽东直接驾驭群众运动，改变了“党权-政权-军权”关系，使军权独大。林彪事件造成文

28 王若水遗作，冯媛编：《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02年。

29 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香港：《领导者》，2013年第1期，总第45期。

30 唐少杰：《文革研究本身是中国政治的某种资源》，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第53页。

革最大的政治危机。³¹

李逊在其著作《上海文革运动史》中，阐述了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体制身份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制度的固化程度较高；政治身份是政治资源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空间，进而提出了“政治名分”的概念，即个人可以通过政治表现的努力，获得某种政治名分，如入党入团或成为积极分子，来改变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有可能改变体制身份。政治名分和所有体制身份之间的这种转换，成为政治运动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个观点对理解文革发生的社会体制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

大跃进失败与文革发生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许多研究者把人事与制度、思想与行为、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实证研究上理清了许多重要的史实细节。1980年代流行的“毛泽东帝王说”、“家天下说”、“权力斗争说”等偏重个人因素的文革起因诸说，现在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这样讲了。严肃的和理性的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八、从空泛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微观研究

近年来，文革史研究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由高层研究转向基层研究。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因为国家档案的不开放，民间研究者无法利用，而口述史料又错误较多，缺乏对证性研究，会有成为历史演义之虞。所以许多文革研究者采取了眼睛向下的研究策略，从大量的民间史料中找寻研究课题，进行实证研究。二是主观原因。近年来，史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转向了微观研究的天地。研究对象都非常具体，强调实证研究。这是历史研究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在这方面，国外学者的文革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都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国内文革研究者是非常有启示的。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仁们，收集了大量的上海文革史史料，做了大量口述采访工作，编辑出版了《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丛刊》，在学界已走到了前列。

31 同上，第29页；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载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

有的人批评微观研究是“碎片”、“局部”。其实微观个案都是与宏观背景有关系的，是要透过个案去反映这个时代。美国马里兰大学华裔学者高崢教授在介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时，曾针对性地讲过这个道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³²高教授所言极是。实际上，坊间所谓的宏观史，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系统而已。许多东西只是意识形态的教科书。

另外，从效果上看，高层研究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出现错讹的可能会更多。史云在《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一书中，曾批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描写周恩来去世后的毛泽东，错用了不可信的网络传言。³³在高层政治人物中，由于作者占有史料与叙述逻辑间的缺环，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而微观研究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大众性民间史料的使用，需要研究者更敏锐的学术眼力和点石成金的学术能力，成果有着更高的学术稳定性。实际上，高层政治的历史叙述，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很强，是最容易搞成“历史演义”的，经常有人编造假史料，愚弄世人。当前在林彪事件研究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出于某些个人目的，不断地制造和散布一些莫须有的“爆料”，试图欺骗公众，混淆视听。

这些年来，文革史在风雨交加中蹒跚前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艰难，但进步也是明显的。毋庸讳言，文革史研究的外部学术环境是相当严苛的，禁忌众多，困难极大，研究者不仅劳而无功，还要冒政治上的风险，没有一点精神是做不来的。所以，多数学人都奔着有课题、有项目、有资金、出成果、出业绩的研究领域去了。这就决定了从事文革史研究者，只能是小众群体。虽然体制环境对文革史研究的限制极大，文革史学科建设举步维艰，但总还是有一批不肯遗忘历史的人，愿意来做这件事，不离不弃，乐此不疲。最可喜的是，第三代文革史学者和第四代学者已经渐渐成长起来了，让

32 (美)高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读〈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兼谈美国的中国学范式》，《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33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第604页，注45。

我们看到了薪火传承的希望。虽然文革史研究现在还是涓涓细流，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将来一定会成为百川归海的学术增长点。中国要想站立在现代文明高地上，就必须清理文革的历史遗产。在这里，只有华山一条道，是没有岔路口的。

而这种清理和反思的需求已经非常迫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基础上，已有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也积累了30年的政治社会问题。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发生了严重的撕裂，需要重建改革的共识。而重建改革共识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就是对文革的“彻底反思”，重新认识中国改革的起点，确立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发展路径。

展望未来，对文革的“彻底反思”，不是那种简单和肤浅的政治定性，而是从历史的长时段、社会的深层次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认真的检讨。不仅要反思文革的理论、文革的制度、文革的文化，还要反思造成文革的社会历史根源，更要反思当前文革左倾思潮回潮的背景原因。这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救赎和现代文明精神的再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还有着以学术影响社会，以学术支持国家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现实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只能来自文革研究的学术本位。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这方面，政治化的“彻底否定”和“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功利主义，正是历史的前车之鉴。在1980年代，我们谁也不会想到，以后还会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坐大，还会有文革左倾思潮的卷土重来。这些实际上都是文革的负资产没有认真清理的结果。

文革遗留下来的负资产，最大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封建主义残余”，实际上讲的就是专制主义的制度和³⁴文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按兵不动，不仅没有切割掉这个体制性的专制主义肿瘤，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又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出现了，对以后中国的发展影响极大。文革中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就失去一切”的权力意志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以权谋私论，正是国内众多官员贪污腐

34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败的思想渊源。

文革研究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说学术是建立社会理性的最好工具，文革史则是学术工具中的最好利器。

“学术是社会公器”。文革史研究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求成为学术的“社会公器”。

但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文革研究的外部条件不会有所宽松，只会是越来越紧。2016年7月13日，国内能够发表文革文章的著名刊物《炎黄春秋》，被主管部门强行夺权。³⁵这一事件表明，文革研究也进入了“新常态”，现有的意识形态管制格局不会改变，体制不会给文革研究有任何开放空间，研究者还是要过“紧日子”的。

更重要的是，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下，是培养不出宽容精神来的。社会的极端情绪会继续发酵，过去撕裂的伤口会继续扩大，左右两端的分歧会进一步发展……，这些极端化的社会戾气，必然会反映到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上来，给文革研究带来非理性的色彩。这是当前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2014年老红卫兵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的，赞誉的，质疑的，谴责的，叱骂的，各种声音都有。宋彬彬再度成为公众人物，过去是老红卫兵杀人施暴的标签，现在是“红二代”虚伪逃罪的标签。不但左右两边都在骂，还把一些文革史学者也给捎带进去了。这里可以看到，文革给我们民族造成的伤痕是很深的，至今社会的戾气仍然还很重，缺乏必要的宽容态度。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文革史的研究是很有压力的。但正因为如此，文革史研究也可以成为理性的和解的学术中介。

真相是反思的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文革史研究的还原历史真相，受到的外部压力要比其他历史研究更大，所以对学术道德的要求也更严格。

学术研究工作是恪守学术本位的中道为职守，要有“不激不随”的态度和价值中立的立场。对文革史研究而言，这不仅是一种

35 2016年7月13日，《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部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奉令单方面撕毁与《炎黄春秋》32年前签订的协议，强行下令改组《炎黄春秋》编辑部，并派出一千人马到《炎黄春秋》编辑部接收印章、财务等。《炎黄春秋》编辑部成员据理拒绝。现在双方正在僵持阶段。此夺权事件有最高层背景，是近20年来最重大的文化事件。

学术研究策略，更是一个治史原则。文革十年，国无宁日，反复折腾，伤人无数，害人无数。人们不为施害者，即为受害者，往往还兼有两者角色。文革的是非恩怨纠缠纷乱，利害关系千差万别，派性观点莫衷一是……，这是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同样会反映到文革研究中来。

特别是，在文革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没有彻底清理的情况下，文革历史的沉淀又加上现实的社会矛盾，在文革研究中继续发酵，成为社会群体分裂的一个文化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许多关于文革的极端言论，仍然还停留在文革的阶级斗争年代。其思维方式的偏执，话语方式的粗鄙，意识形态的戾气，党同伐异的霸道，拉帮结派的狭隘，望文生义的无知，自信满满的粗浅，都可以看到文革反智主义的遗毒影响。所以，文革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还具有建立社会理性的道德责任。

文革史研究在建立社会理性上的作用，表现为“去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公器”原则。即恪守真实性的科学原则，超越过去的是非恩怨，摆脱现实的政治屏障，建立专业化的学术规则和去政治化的学术自律机制，通过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以学术智慧引领社会舆论，逐渐弥合社会撕裂的创口。这就是文革史研究需要秉承学术中道的现实意义。

走出文革，最难的是走出文革思维。文革思维具有绝对化、简单化、暴力化、道德化、标签化的非理性特点，以制造圣人与魔鬼为能事，各种“替罪羊”层出不穷。文革中盛行一时的党同伐异的斗争哲学，政治挂帅的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革命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的恶劣文风等等，对现在的文革研究也有重大影响。

在当前的文革研究中，非学术化现象相当严重。如“翻案风”现象，为文革标志性人物翻案，寄予当下的某种政治诉求；“标题党”现象，题目空大无当，内容文不对题，语言夸张，逻辑混乱，误导和欺骗读者；“虚构党”现象，以商业化写作冒充历史研究，以文学创作冒充历史叙述，编造史料，虚构史实；“帮派史学”现象，以历史研究为名，搞党同伐异的小帮派，对不同意见群起攻之；“谴责史学”现象，以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代替认真细致的学术研究，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化为黑白两道，罔顾史料的真伪，不分史实的有无，就以恢复历史的道德真君的面孔肆意评说。

这些非学术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文革学风，不讲史实，不讲道

理，以观点为取舍，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这种恶劣学风与文革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家的观点，甚至编造假史料，捏造史实，故意制造混乱，有明显个人利益的企图。当前以林彪事件的研究最为集中。所以，在文革研究中，也有一个走出文革的问题。

清理文革文风，需要从史观开始。如“工具论”史观，是把文革史研究当做表达某种政治诉求，谋取经济利益的学术工具。这是过去“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当代版。其滥觞就是文革中甚嚣尘上的“影射史学”³⁶。

“阴谋论”史观，是把文革归因于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搞的政治阴谋，说成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的权力斗争，为了让江青接班而打倒刘少奇、逼走林彪。这实际上还是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观”的历史模式，没有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中脱胎出来。

“替罪羊”史观，把文革的罪错责任，归咎于某个或几个人物的道德品质问题，似乎把他们骂倒骂臭，就能给我们民族的众业赎罪了，也就能把我们自己给解脱出来了。官方史学是将文革诿罪于林彪、“四人帮”，而一些民间言论则是诿罪于毛泽东。其实都是同一个逻辑。该史观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忽视了对制度、文化、社会根源的深层次追问。以为文革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而为自己寻求某种政治的或心理的解脱。

需要提示的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环境下，文革史的学科环境不会有大的改观，健康的学术发展平台一时难以建立，在文革史上的认知分歧会继续扩大，社会大众情绪会继续发酵，小众的学者群体必然势单力薄。这是文革史研究者的无奈和宿命，也是他们的责任与坚守。

今日的文革研究，处在危机与希望、艰难与出路、抑制与转化、矛盾与契机共生并存的局面。³⁷这是多年来文革史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今后发展的台阶。笔者认为，目前文革研究的学术化转型，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在存史、理路、交流方面还有很大不足，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存史工作、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理路、积

36 有关文革“影射史学”的分析问题，可见于余英时1981年写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文，载于余英时著、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7 唐少杰：《研究文革的意义非同寻常》，《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极的学术交流和健康的学术批评。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文革研究者对学术公器原则的坚守，能够创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有规则的研讨环境。

第一，存史工作的问题。文革史以存史为第一要务。史料工作历来为学者重视，口述史料尤其为文革史家青睐。现在，一些学者已把主要精力放到收集整理文革史料方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理念。一部完备的资料集可以整体提升学界的研究水准，要比学者个人写一两本书更重要。

现在的存史工作，除了史料的发掘、收集外，整理和利用的问题比较突出。1、目前坊间大量的口述史料，虚虚实实，出入很大。所以，一是需要加强口述采访的规范性，提高口述史料的学术质量。二是需要对现有的口述史料进行学术梳理，通过去伪存真的校勘和鉴别工作，确定其史料价值。2、海外学界现在收集了大量的文革史料，这是海外研究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这些材料大部分还是“原生态”，缺乏系统化的鉴别和整理，使用起来困难较大。3、国外史料系统方面，虽然已翻译了不少资料，但更大量的资料还没有翻译。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方国家有大量的档案资料，对从外部世界研究中国文革，是非常重要的。

在存史的理念上，应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存而不论的态度，尊重不同观点的历史叙述。历史的真相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多种解释，多种史料，多种记忆，多种版本的共存。每个人都有讲述历史的平等权利。对存史工作而言，追寻的是事实的有无，而非是事情的对错。

第二，研究理路的问题。文革史是中国百年革命的顶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汇点，其复杂性是无以伦比的，所以就文革本身讲文革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必须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认识，运用更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去分析。过去的文革史研究，无论是阶级斗争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其基本点都是评判历史，历史叙述是单线条平面化的政治史框架，视野狭隘，观点刻板。现在的文革史研究的任务，则是要呈现出历史多面相的复杂性，展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全方位的立体的构建历史的叙述系统。这是需要更多的学科工具来实现的。

文革史的客体庞大、内容复杂，需要结合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才能有全面的展现和认知。但学界在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时，

水平差距很大。有些学者生搬硬套地使用一些学科概念的做法，这实际是一种取巧的做法，表面看起来花里胡哨，实际的知识含量不多。国外学者的文革史研究，小切口，大纵深，题目具体，分析深刻，背景知识广博，重视社会文化，是从微观的视角来透视整个时代，给国内研究者很有方法论启示。一些大学举行的小型工作坊会议，对促进国内外多学科的交流很有帮助。

在其他学科的文革史研究中，笔者比较推崇中国法制史学者徐立志对文革法制状况的研究³⁸。他的研究认为：文革时期不是“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破坏也没有严重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在出现破坏的同时，还存在着原有法制在“文革”环境下延续和强化的现象。不仅所有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都在严厉禁止之列，反革命受到严刑镇压；同时还按运动需要进一步强化了政治身份制度。这些看法，是文革史学者提不出来的，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三，学术环境的问题。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需要有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和学术批评机制，为学术的发展起着激浊扬清的作用。但在文革史研究中，这是过于奢望的要求了。在学界小众与社会大众，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都存在着巨大制度性的阻隔，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致使一些错误的史实、造假的史料、虚构的伪作，野史类假书长期在坊间流传，影响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如报告文学作家师东兵，自称采访了许多文革政要人物，编写了文革系列的作品18本之多，号称“高层内幕作家”。2010年，数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的采访，斥之纯属造假，涉嫌诽谤。³⁹2010年9月，师东兵另因诈骗他人财物被判刑。此事可见坊间任意编造历史的乱象。

严肃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不二法门。但在文革史研究中，健康的学术批评的开展是最为困难的。其一是缺乏一个理性讨论问题的公共平台。由于意识形态管理的原因，国内学术媒体一般都不敢讨论文革，更不敢讨论文革的境外出版物。而个别敢刊登文

38 徐立志：《“文革”时期原有法制的延续与强化——对文革法制及相关研究体系的重新探讨》，2015年2月，德国弗莱堡大学“数字人文与毛时代遗产”国际研讨会论文。

39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伪造高层党史》，《南方周末》，2010年9月14日。

革文章的网刊，又缺乏必要的学术识力。所以，文革的境外出版物成为了学术批评的盲点。有许多弄虚作假的伪作、错误百出的劣作。“标题党”现象也就这么来的。这些东西的错误其实很浅显，专业工作者通常不屑一顾，但对非专业人士就可能产生误导，所以评论它们也有必要。如2016年6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小型文革史会议上，参会的军史研究者就对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从史料和史实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批评，认为该书“历史事实不清且错误百出”。⁴⁰在历史研究中，学术评论起的是过滤网的作用。没有过滤的东西，质量是有疑问的。

其二是缺乏正常讨论问题的学术规范和程序。讨论程序这套东西，对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人们熟悉的是文革中声势夺人的革命大批判，而不是讲求证据的学术批评。我们在网上到处可见，在讨论某个问题时，讨论者往往会越界发言，偏离讨论主题，不去就事论事，进行证据和理路的辨析，而是搞人身攻击，贴标签戴帽子，把学术批评搞成了革命大批判。批评者很难全身而退，经常还会搞出一场官司来。文革研究已经进入了“无义战”的战国时代。

笔者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2013年12月，笔者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批评报告文学作家贾舒云的《“九·一三事件”十大疑团》一文，涉嫌篡改史料、编造史料、虚构史实等学术不端行为。⁴¹随后，贾舒云和丁凯文联袂在海外媒体发文抨击笔者。⁴²贾舒云还把笔者与另一位批评者，在《炎黄春秋》发表批评文章的刘家驹老人，一并以名誉侵权为由告到了法庭。实际上，无论《中华读书报》，还是《炎黄春秋》都告诉过贾舒云，同样可以发表她的反批评文章。她完全是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的。

其实，在学术的平台上，这些无端之乱是很容易解决的。高层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时代的中心问题进行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事

40 徐金洲：《关于〈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的若干史实错误》，2016年6月11日，复旦大学《历史，政治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高端工作坊》，2016年6月。

41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北京：《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11日。

42 舒云：《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丁凯文：《中央党校里的“帮派史学家”》，《新史记》2014年，总第18期。

情，都有确定的选择域界，是可以寻踪的。⁴³许多所谓“疑团”的问题，只需要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做一篇学术史梳理，搞一个大事记，事情大体也就清楚了。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真理越辩越明”。文革史的深化研究，需要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无论外部条件如何，我们学者也都要有这种学术自律。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从评价性历史转到描述性历史。历史叙述的重点，不是去评论历史的功过是非，而是复原历史的现场原貌。评价性的历史是黑白照片、单色调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是彩色照片、多层次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旨在揭示更多的历史复杂性。过去一些脸谱化的、鬼神化的人物形象，在描述性历史中都要重新得到梳理。

文革的历史是20世纪最为复杂的中国历史。其发生的远因，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的起源；近因又直接关联到大跃进的失败。外因有世界冷战格局和国际共运的共同影响，内因有领袖极权体制和左倾思潮的双重作用。而文革的发生，又把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释放出来了，使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数，运动的部署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出现节外生枝的事情。同时，在文革的动乱中，高层与底层，城市与农村，精英与群众，领袖与人民……，又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在不断地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多主体、多重奏、多声部的宏大历史场景，研究起来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文革历史时，就不能用黑白照片的单色调，也不能仅是正面人物的单一主体。在文革这部宏大的历史剧中，正角、反角、配角，领袖、干部、群众，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都要在现场，各有各的戏码，他们一起演出了文革这部大剧。笔者所说的构建文革史的多复线叙事结构，就是说要对文革有全方位的反映，构建出历史场景的全景图、揭示出复杂联系的因果链条。

文革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实在太深了，有些伤口现在还在滴血。可能在文革这代人身上，文革的创伤很难弥合得了。但如果我们能留下一部内容完整的、角色齐备、色彩斑斓的历史记录，相信后人

43 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

会更有智慧去破解文革难题的。

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已显露了一些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开始从宏大叙事走向实证研究，从高层研究转到底层研究，中观研究的开展，微观研究的兴起；论者遍及各地，不但说北京话、还说上海话、湖南话、东北话、山西话、贵州话、四川话……，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民间队伍。但是，当前的文革研究还有一些短板，许多方面轻重失衡，要做到历史的多复线叙事，立体地呈现文革的复杂历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简单说来就是：1、在高层与底层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传统的帝王将相史历史叙述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底层社会和民众的命运；2、在宫廷和百姓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宫廷政治的狭隘性，大历史是没有阴谋论的，历史叙述最有分量的还是普罗大众的历史；3、在国家与社会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国家决策主导、社会被动顺应的简单叙述逻辑，转为国家与社会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整的复合叙述逻辑；4、在精英和大众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精英阶层落难史的单一历史叙述，在文革中真正受苦遭难的还是底层民众，特别是政治贱民的“黑五类”们。多数精英也是从大众中产生出来的；5、在城市和农村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城市中心论的文革叙事，农村是文革史的重要内容，有许多特点。特别是城乡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6、在政治与生活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政治史的文革叙述，尽管文革搞的都是“政治挂帅”，实际上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活逻辑，政治史要与生活史结合；7、在特殊和普遍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过分强调文革特殊性的历史叙述，文革的特殊性与文革前的普遍性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不能割断；8、在非常和正常的叙述关系上，要走出偏重非常态化的文革叙述方式。史学家不是猎奇的新闻记者，大量处理的主要是常态的日常材料。这些常态的材料，具有社会结构性的意义。⁴⁴

从学理上说，文革历史的多复线叙事，就是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历史叙述。笔者认为，今后的文革史研究，应是走专业主义的实证研究路线。通过史实研究来复原历史现场，揭示历史的复杂性，给社会提供接近真相

44 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北京：《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的摹本。从文革学科发展的状况看：高层政治史的研究，各种叙述相互矛盾，缺乏足够根据，需要扩大史源，解决的是史料问题。底层社会史的研究，民间史料丰富，可以说是史料横溢，驾驭史料的问题突出，解决的是方法问题。宏观研究，是多学科介入的长时段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理论问题。中观研究，是对社会制度框架和组织系统进行的历史考察，解决的是结构问题。微观研究，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的历史考察，以小见大地反映整个社会，解决的是个案问题。

现在文革史研究最大的瓶颈，自然还是政治对学术的管控。中国是一个重史的民族，著史传统悠久，各朝史籍汗牛充栋。以史为鉴，是历代政治家的典训。中国现政府也不断地在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但都是告诫他人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并不包括自己在内。这是把历史当成政治外交上的一个技术工具了。审视过去的政治得失，作为今天的资政镜鉴，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历史最大的利益是提供自省和反思。但其前提是，这个历史必须是真历史。而这，正是政治家和史学家当前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所在。政治家的历史是从意识形态模型浇铸出来的历史，不符合这个模型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史学家的历史，是准确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不能反映历史真相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构主义。所以，前者搞的是价值判断，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就是否定历史；后者搞的是事实判断，是欢迎质疑的，越质疑就越能搞清楚历史真相。这些问题，在文革史研究中最突出。但是，历史是绕不过去的。遗忘历史，虚构历史，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对文革教训的反思不够，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文革研究的最主要危机，还是在后继乏人的问题。文革研究的第一代人已经进入暮年，青年一代的研究者还在成长中。研究文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寂寞的，都会有一个学术志向与生活现实的矛盾问题。这就决定了，新一代的文革研究者，注定要比同龄人担负更多的压力。但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学术前途一定会是大放光明的。正如老历史学家周良霄、顾菊英所言：“研究文革，虽然在今天仍处文网厉禁，但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本文以唐少杰教授的话来表达学界同仁对文革学科发展

的共同期许：⁴⁵“文革学”应该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系统性的学科，既立于文革历史，又高于文革历史，更是对于文革历史运动及其本质的理性审视和思辨把握。这种“文革学”交叉性地包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学科的因素和方法。这种“文革学”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成为中国现代精神的一面自我之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自我超越。⁴⁶

参考文献

1. 韩钢：〈38年来“文革”史研究的五点变化〉，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2. 《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北京：《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4. 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
5. 王海光：〈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炎黄春秋》2015年7月。
6. 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香港：《领导者》，2013年第1期，总第45期。
7.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北京：《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11日。
8. 王光宇：《青史难隐》，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
9. 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0. 王若水遗作，冯媛编：《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们眼中的伟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02年。
11. 金大陆、金光耀：〈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
12. 金大陆：《正常与非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45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前言，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46 唐少杰：《文革研究本身是中国政治的某种资源》，《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13. 金大陆：〈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
14.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15.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16. 李秉奎：《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7.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18.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19. 周良霄、顾菊英：《十年文革大事记》，前言，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20. 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作者赠文。
21. 周泉纁：《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22.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23. 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五柳村网站，2015年7月7日。
24.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25.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
26.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27.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28.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 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30. 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
31.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32. 老鬼：〈我的父亲马建民〉，《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33. 唐少杰：〈文革研究本身是中国政治的某种资源〉，上海：《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第53页。
34. 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载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

35. 唐少杰：〈研究文革的意义非同寻常〉，《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36. (美)高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读〈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兼谈美国的中国学范式〉，《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37.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38. 余英时著、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9. 徐金洲：〈关于〈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的若干史实错误〉，2016年6月11日，复旦大学《历史，政治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高端工作坊》，2016年6月。
40. 徐立志：〈“文革”时期原有法制的延续与强化——对文革法制及相关研究体系的重新探讨〉，2015年2月，德国弗莱堡大学“数字人文与毛时代遗产”国际研讨会论文。
41.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师东兵伪造高层党史〉，《南方周末》，2010年9月14日。
42. 舒云：〈岂止不懂装懂，更是恶意诽谤——驳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丁凯文：《中央党校里的“帮派史学家”》，《新史记》2014年，总第18期。